

厕筹源流与规制演变考

李佳原

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收稿日期：2026年8月31日；录用日期：2026年9月26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9日

摘要

厕筹起源有本土说与外来论之争。考古及文献参证表明，西汉敦煌烽燧遗址废简与人粪共存，证实中国本土早在印度律典东传前即以废简拭秽；外来律典制度东传后，为厕筹提供了系统化的材质标准与操作规范，使其从临时用具升格为制度化的律仪法具，并渐向世俗扩散。厕筹演变轨迹展现了本土传统与外来制度的融合，是制度移植与习俗交互的典型样本。

关键词

厕筹，制度移植，民俗，物质文化

A Study on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Cechou

Jiayuan Li

Colleg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Received: August 31,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26, 2026; published: October 9, 2026

Abstract

There is a debate regarding the origin of the “Cechou” (small pieces of wood and bamboo used for cleansing after defecation), with some arguing for a local origin and others for a foreign one. Archaeological and textual evidence indicate that discarded bamboo slips were found alongside human feces at the Western Han-era Dunhuang beacon tower site, confirming that in China, discarded bamboo slips were used to wipe away excrement long before the transmission of Indian legal codes to the East; After the transmission of foreign legal codes to the East, systematic material standards and operational guidelines were established for the Cechou, elevating it from a makeshift tool to an institutionalized ritual implement governed by legal codes, and gradually leading to its diffusion into secular life.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of the Cechou illustrates the fusion of indigenous

traditions and foreign institutions, serving as a classic example of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a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of customs.

Keywords

Cechou,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ation, Folklore, Material Cultur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如厕拭秽习俗虽属日常生活细节，却关涉社会文明程度与文化传播机制的考察。尚秉和的《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1]一书出版于1939年，其中设单独章节对中国古代的厕溷制度、厕所建造及如厕用具结合相关的文献进行了简要介绍，关于厕筹的相关记载亦有提及。该书也为后世相关研究奠定了一定的文献基础，此后陆宗达的《释“厕”》[2]一文从训诂学角度考析“厕”字义涵，张建林的《浅谈汉代的厕》[3]则基于考古材料分析汉代厕所结构，均在各自领域有所推进。

在厕筹起源问题上，学界目前主要存在本土说与外来说两种观点。王志轩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经历了明显的修正过程。其早期所作的《中国古代拭秽风俗流变考》[4]一文，明确主张“厕筹在三国时期随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然而在该文的后续研究中，王志轩逐渐意识到此前结论存在不足。他在《厕筹杂考》中坦承，《中国古代拭秽风俗流变考》“为一时兴致而作，并非定稿，错谬良多”[5]。基于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西汉宣帝时期废弃简牍与人粪共存的现象，王志轩确认西北边塞驻军已使用废旧简牍作为拭秽工具，实物证据早于佛教正式东传约两个世纪，由此“对厕筹印度传入说采取谨慎的态度”[5]。这一从明确主张传入说到审慎存疑的转变，体现了其学术判断随考古新材料而调整的过程。

持本土说着力最深者当属劳诸的《琐说“厕筹”》一文，该文综合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简牍与人粪共存的考古事实，以及日本藤原京遗址发现的7世纪末厕筹实物，明确主张厕筹为汉地固有之物，其使用并非受佛教影响[6]。此外，任强《“厕筹”非“乾(干)屎橛”——〈汉语大词典〉释义正误》一文辨析《汉语大词典》将“干屎”释为厕筹之误，指出“干屎”原指干燥粪便，在禅宗语录中属用以破除执着的机锋语，并非实际拭秽工具，从词义考辨角度澄清了相关误解。并且任强在文中亦认为厕筹是我国古已有之的拭秽工具，“南方以竹木片为之，而北方，木片之外更多的是用秫秸(即高粱秸秆)为之”[7]。韩国学者金光彦在《东亚的厕所》第一章韩国的厕所中介绍厕木写道：“中国从秦代开始用竹子或长木条来擦屁股，开始使用手纸则是从公元13~14世纪开始的。竹子后来又传入了韩国”[8]。这也说明在古代，中国和印度有相似的拭秽传统，并对东亚地区产生了影响。

综合上述研究，厕筹的使用史并非单一来源的传播，而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相似习俗交汇融合的结果。佛教戒律的传入，使原本在民间虽已存在但尚无统一规范的拭秽行为获得制度性约束，至唐宋时期，寺院内部已形成一套系统化的使用规范，元以后民间则渐以粗纸代之。厕筹的演变轨迹，为考察戒律制度与汉地民间习俗之间的互动融合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

2. 考古实物与文献中的早期厕筹记载

(一) 现有的考古发现

现有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拭秽习俗所依据的考古资料，核心是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1979年甘肃

省文物工作队对该遗址进行发掘，T4 探方发现简牍 18 枚，大多出土于南堡墙外的苇篱夹道东侧的石头下[9]；T5 探方发现 443 枚简牍，灰坑中混有不少人粪，证明灰坑曾作厕所使用，说明废弃简牍被用作便后拭秽[10]。该遗址约在公元前 65 年至前 50 年，此时印度佛教尚未传入中国，王志轩和劳诸据此认为烽燧戍卒使用废简为拭秽之物并非受佛教徒影响，为“厕筹中国古已有之”提供了关键的考古佐证[5] [6]。

与之相类的发现还有居延汉代甲渠候官遗址，1973 年至 1974 年间原甘肃省居延考古队在该遗址坞门东三十多米的一处灰堆内清理出三千多板简，其中不少杂含粪便，说明这些废简曾用作拭秽，进一步印证了汉代边地军民以废简拭秽的做法并非孤例。此外日本多处遗址出土的筹木也值得重视，1992 年在奈良县藤原京遗址发现 7 世纪末的厕所遗迹，厕坑中出土筹木 150 余根，福冈市鸿胪馆遗址(约公元 720 至 730 年)也发现了类似厕筹，岩手县柳之御所遗址(11 至 12 世纪)出土了大量规格平均长 24、宽 0.5 至 0.8、厚 0.5 厘米的厕筹[11]，由于唐宋间中日交往密切，王志轩认为这些日本考古发现对推论唐宋时期中国人的拭秽工具很有参考价值[5]。

(二) 学术史中的文献线索

早期佛律与文献记载方面，《毗尼母经》第六卷中释迦牟尼制定的“上厕用厕筹法”是讨论佛门厕筹规范的经典依据，其中明确规定“所应用者，木竹苇作筹。度量法，极长者一磔，短者四指。已用者不得振令污净者，不得着净筹中”[12]。这段文字在王志轩和劳诸的论述中均被完整引用。《法苑珠林》卷十三所记三国孙皓“置于厕处令执屏筹”[13]之事，被王志轩明确指为“中国文献中所能找到的最早的厕筹记载”[5]，劳诸亦引此文并释“屏筹”为“弃之厕筹”[6]。

魏晋南北朝时期，《晋书·刘寔传》所记石崇家如厕之事，劳诸详细引用了刘寔见“绛纹帐，裯褥甚丽，两婢持香囊”[14]的情节，王志轩则补充“所进锦囊，实筹”[5]，两文皆借此说明上流社会中厕筹的广泛使用。

隋唐时期，《资治通鉴》中的两条材料最具代表性。北齐高洋“虽以杨愔为宰相，使进厕筹，以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15]；韩滉“下至厕筹，滉皆手笔记列，无不周备”[16]，两条材料均被两位学者分别引用，用以说明厕筹在宫廷及官方物资调度中的日常性。《马氏南唐书·浮屠传》记李煜“亲削僧徒厕简，试之以颊，少有芒刺，则再加修治”[17]，劳诸另引《江南野史》“亲为桑门，削作厕简子，试之，腮颊有少涩滞者，再为治之，其手不抄”[18]，两条材料互为补充。

元代，陶宗仪《辍耕录》“今寺观削木为筹，置溷圉中，名曰厕筹”[19]之条亦为说明厕筹习俗在寺观中延续的重要依据，王志轩和劳诸均有引用。

3. 域外律典仪轨对厕筹的规范与民间传播

经过上述文献考证不难看出厕筹在我国古已有之，并非外来产物，但其最初的出现是作为简牍再利用还是专门的拭秽器具，目前尚无确凿定论，也尚未形成系统的使用规范。域外律典传入后我国的寺院体系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拭秽流程，并在民间得到传播。

(一) 东晋至南北朝：材质尺寸的初步规定

厕筹最初见于汉译律典时，仅作为一件基本使用的日常器物。《毗尼母经》卷六载：“所应用者，木竹苇作筹。度量法，极长者一磔，短者四指。已用者不得振令污净者，不得著净筹中。是名上厕用筹法。”[12]同经又云：“若无筹，不得壁上拭令净，不得厕板梁椳上拭令净，不得用石，不得用青草。”[12]《摩诃僧祇律》卷三十四载：“用竹作筹草伤破身……佛言：从今已后不听竹片苇片木札及骨。应用滑物圆物。”[20]《四分律》卷四十九亦载：“佛言：‘不应用长厕草，极长一搥手。’彼用叉奇厕草杂叶、若用树皮、用草牛屎拭，佛言：‘不应尔。’彼用短厕草污手，佛言：‘不应尔，极短长四指。’”[21]此阶段各部广律已涉及材质、尺寸、禁用种类及处理方式，但多为零散禁令，尚未构成完整的操作体系，

厕筹仍属服务于身体清洁的日常用具。

(二) 唐代：厕筹形成系统完备的使用仪轨

至唐代，道宣律师将上厕纳入完整的行护律仪，厕筹由零散禁令升格为具备严密次第的操作规范。其《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明确要求：“常具厕筹，不得失阙。”针对夜间如厕，规定“夜暗黑当用厕筹于厕孔中向前后划，令知阔狭长短正及不正”；针对用后处置，规定“用厕筹了，当刺厕孔中，不须安堦内及板上；不得用文字故纸。”^[22]道宣将上厕拆解为入厕、探察、拭秽、处置等多道连续工序，使厕筹的使用具备了完整严密的操作流程。义净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随意事》卷一亦载：“若见有厕草阙，及君持无水，应即添著并安旧处。”^[23]厕筹与净水瓶并列，成为僧团每日必须查验的固定物资。《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更载：“便利既了，筹用拭身，便以左手取其一土向下洗净，复取一土洗小便处。”^[24]厕筹与土块搭配使用，形成完整的清洁流程。至此，厕筹之使用规范已臻于细密周全，其作为律仪法具的身份牢固确立。

(三) 宋代：日用器具的哲理化象征转化

两宋之际，禅宗丛林将厕筹从具体器物拈提为截断学人妄念的教法象征。《正法眼藏》卷一载：“总恁么，总不恁么，是东司头厕筹子。以此称提，从上来事，尽是邪魔所作，谤大乘，灭胡种，与你天地悬殊。”^[25]《古尊宿语录》卷三十八亦载：“总与么总不与么，是东司头厕筹子。”^[26]厕筹在此已完全脱卸其清洁身体的实用功能，转而成为破除二元对立的哲学工具。其始见于云门文偃禅师“乾屎橛”公案，“僧问云门如何是佛门云乾屎橛”^[27]，《景德传灯录》亦载：“时有僧问：如何是无位真人？师下禅床把住云：道。二僧拟议，师托开云：无位真人是什么乾屎橛？”^[28]乾(干)屎橛即用后干涸之厕筹，以此回答“如何是佛”，彻底剿绝学人对佛相庄严的执着想象。厕筹至此成为禅宗话头中勘验学人的固定符号。

(四) 南北朝至明清：从寺院规制到民间日用

厕筹之使用规范并未长久封闭于寺院，而是渐次流布于世俗社会，但亦有所限。《北史·齐纪》载北齐文宣帝如厕时“令杨愔执厕筹”^[15]，帝皇之尊亲用此物，可见其已进入宫廷。唐代《资治通鉴》载镇海节度使韩滉运送物资至关中，“下至厕筹，混皆手笔记列，无不周备”^[16]，厕筹已成为大规模物资调配中的常规物品。南唐《南唐书·浮屠传》记后主李煜“亲削僧徒厕简，试之以颊，少有芒刺，则再加修治”^[17]，帝王亲自为僧人修治厕筹，足见佛门规制对世俗社会的深刻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厕筹在民间不仅用作拭秽，更被纳入医药体系。唐陈藏器《本草拾遗》载古厕木可“熏鬼魅、传尸、温疫、魍魉、神祟”^[29]，厕筹则可“烧取热气”以治难产及霍乱转筋；《圣惠方》亦记取尿坑中竹木刮涂可治小儿齿迟^[29]。《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厕部汇考收录此说，足见厕筹已从日常器物延伸为民间方药的取材来源。

至元末，陶宗仪《辍耕录》载“今寺观削木为筹，置溷圉中，名曰厕筹”^[19]，表明此制在元末寺观中仍有延续，然民间用纸已渐普及。明人胡应麟《甲乙剩言》记客安平所见，“其俗如厕，男女皆用瓦砾代纸”^[30]；清人郝懿行《证俗文》转引此文并补述其时各地差异，云山寺僧人用厕筹者“十之八九，用过仍濯而再用之”，而西北宣大及两川诸郡“俱用瓦砾，并无厕筹者”^[30]。明清之际，厕筹之使用已分化为三条并行路径：寺观僧众恪守律制、以筹为常；北方及西南边地民间因纸资源匮乏而取瓦砾代用；江南及中原经济发达地区则以粗纸为日常之需。明宋应星《天工开物》记纸产用途，“此纸十七供冥烧，十三供日用”^[31]，可证粗纸在民间日用中已占据相当比重；《红楼梦》中刘姥姥要纸解衣之细节，亦折射出清代日常用纸之普及。

4. 结语

综上所述，厕筹之使用并非外来文化传入之物，敦煌马圈湾及居延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废弃简牍

与人粪共存的考古事实，已确凿证明西汉宣帝时期西北边塞戍卒即已利用废旧简牍充作拭秽之物，其出现时间早于佛教正式东传约两个世纪。然而，汉代边地的此类实践仅为零星自发的权宜之举，既未形成统一的材质标准，亦缺乏系统的操作流程与禁忌规范。真正使拭秽行为从随意走向制度化的关键转折，在于印度律藏东传之后，以《毘尼母经》《摩诃僧祇律》《四分律》为代表的汉译律典首次从材质、尺寸、处置方式等维度对厕筹作出系统性规定，至唐代道宣、义净等律师更将其纳入完整的行护仪轨，厕筹遂由一件简单的日常器物升格为操作程序严密的律仪法具，寺院制度由此得以确立。宋代禅宗则进一步将其拈提为话头公案，使厕筹从实用器具跃升为破除凡圣执着的教法象征。而这一由寺观确立的规范体系，经由南北朝至于明清的长期流播，渐次渗入宫廷与民间社会，《北史》《资治通鉴》《南唐书》《辍耕录》等史籍所载帝王将相亲用厕筹之事，即为明证。就目前材料而言，中国早在西汉已有使用废弃简牍拭秽的事实，而印度戒律为厕筹的使用提供了系统化的规范。两者并非简单的取代关系，而是在历史进程中相互融合，中国本土已有的竹木简牍和秫秸使用习惯为厕筹的普及提供了物质基础，东传的戒律制度则为其使用赋予了规范性与神圣性。厕筹的演变历程表明，中国本土简牍再利用传统与印度传入的戒律制度在历史进程中相互融合，由此成为观察文化交融和民俗演变的一个微观样本。

参考文献

- [1] 尚秉和. 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M]. 长沙: 商务印书馆, 1939: 312-315.
- [2] 陆宗达. 释“厕”[M]//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122-125.
- [3] 张建新. 浅谈汉代的厕[J]. 文物, 1987(4): 53-58.
- [4] 王志轩. 厕筹的演变与进化[N]. 大众科技报, 2005-08-16(007).
- [5] 王志轩. 厕筹杂考[J]. 华夏考古, 2010(1): 133-135+152.
- [6] 劳诸. 琐说“厕筹”[J]. 文史知识, 2012(11): 59-61.
- [7] 任强. “厕筹”非“乾(干)屎橛”——《汉语大词典》释义正误[J]. 枣庄师专学报, 2000(4): 5.
- [8] [韩]金光彦. 东亚的厕所[M]. [韩]韩在均, 金茂韩,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8: 81.
- [9]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金沙遗址概述[M]//金沙淘珍.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2: 1-12.
- [10] 周志清. 文明的连续与断裂——成都平原史前文明在中国多元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与影响[J]. 成都文物, 2003(1): 15-19.
- [11] 邓伯清. 四川新凡县水观音遗址试掘简报[J]. 考古, 1959(8): 404-410+453.
- [12] 失译. 毗尼母经: 卷第六[M]. 高丽藏本: 17-18.
- [13] (唐)道世. 法苑珠林: 卷第十三·敬佛篇第六[M]. 高丽藏本: 5.
- [14] (宋)潘自牧. 记纂渊海: 卷四十七[M]. 四库全书本: 12.
- [15] (宋)沈枢. 通鉴总类: 卷三·赠谥门[M]. 四库全书本: 43.
- [16] (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 卷二百三十一[M]. 孔天胤明嘉靖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刻本: 1.
- [17] (宋)马令. 马氏南唐书: 卷之二十六·浮屠传第二十二[M]. 四部丛刊明刊本: 1.
- [18] (宋)龙衮. 江南野史: 卷三[M]. 张德荣清抄本: 6.
- [19] (元)陶宗仪. 辍耕录: 卷十二·园池记[M]. 四库全书本: 6.
- [20] (东晋)佛陀跋陀罗, 法显. 摩诃僧祇律: 卷第三十四·明威仪法之一[M]. 高丽藏本: 12.
- [21] (东晋)佛陀耶舍, 竺佛念等. 四分律: 卷第四十九·法捷度第十八[M]. 高丽藏本: 10.
- [22] (唐)释慧淑. 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讲述: 卷下[M]. 明治刻本: 18-20.
- [23] (唐)义净.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随意事: 一卷[M]. 高丽藏本: 1.
- [24] (唐)义净.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 卷第十六[M]. 高丽藏本: 3.
- [25] (南宋)释宗杲, (南宋)释妙喜. 正法眼藏: 卷上之上[M]. 元和宽永刊本: 26-27.

-
- [26] (南朝宋)顾藏主. 古尊宿语录: 卷之三十八·襄州洞山第二代初禅师语录[M]. 明万历至清康熙间刻嘉兴藏本: 1.
- [27] (唐)观谁, (唐)寂亮, (唐)完矩录. 夔州卧龙字水禅师语录: 卷三·僧问云门如何是佛门云乾屎橛[M]. 明万历至清康熙间刻嘉兴藏本: 9.
- [28] (宋)释道原. 万僧问答景德传灯全录: 卷二[M]. 元刻本: 4-5.
- [29] (清)陈梦雷. 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历法典第九千八百八十一卷·厠部汇考[M]. 雍正四年内府铜活字印本: 25.
- [30] (清)郝懿行. 证俗文: 卷三[M]. 光绪七年本: 59.
- [31] (明)宋应星. 天工开物: 卷中[M]. 刻本: 71.